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

记者:蔡老师好!祝贺您的《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您怎么看待这份荣誉?

蔡崇达: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和寓言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之一,都必须有能力举重若轻——这两者都得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抵达最本质的命题。儿童文学要使用的,是儿童都能读懂的语言,却要触及生而为人,以及人与世界展开关系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根源性命题;寓言则必须通过社会大众都听得懂的语言,触及最普遍的时代及社会命题。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标准,能获得文学最高形式之一的最高标准的认可,于我而言,是巨大且重要的鼓励,会帮我确信、笃定自己在写作中追求的一些方法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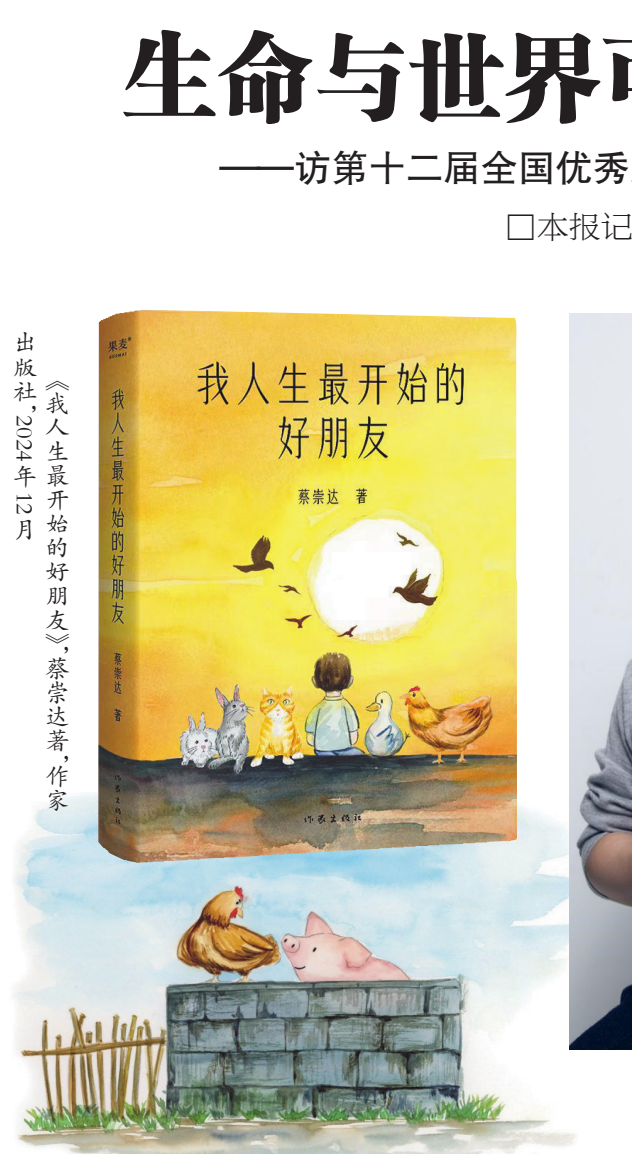
记者:书的前言中写到,您五六岁时就想写下与动物朋友的告别,“用文字搭建一个窝”来留住它们。这个念头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此时完成这份童年的约定?

蔡崇达:正如前面所说,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必须用最浅的语言抵达最深的命题,这种能承载重的轻,对我来说,是个需要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事实上,我恰恰是在写过非虚构作品、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尝试用合适的文体去抵达人心后,我才敢确认,或许自己可以尝试儿童文学写作了。在我看来,人类之所以找到、发现、发明各种文体,是因为人内心不同层面的命题,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抵达。

写作《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的直接促因是我女儿。我女儿小学三年级时,和许多孩子一样,内心生发出诸多新鲜的情感和情绪,开始对阅读感兴趣。她找出我此前的作品阅读起来,最终苦恼地对我抱怨:爸爸,你能写本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看的书吗?我才发现,进入她阅读书单的,大量是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好的儿童文学,必然要写出所在民族文化的底层逻辑和根本模型。从她当时阅读的比例上来看,我们关于自身文化的呈现是比较不够的。同时,或许是受时代迅速发展、知识急剧迭代的焦虑的影响,连儿童读本也有大量知识性教育的内容,而对生命教育本身则强调得不够,而这在我看来,是文学必须去参与的工作。事实上,在这个知识极速迭代的时刻,我反而更有生命教育的迫切感——知识迭代下的“知识填鸭”,性价比极低,反而加剧了对人心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知识迭代的加速会成为常态,就更应该有迫切的意识,要陪同孩子建立起和这种巨大的内心冲击相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因此,结合我女儿成长的需要,我觉得很有必要写作一本能提炼出我们所在文化的精神模型、能陪伴参与生命教育的作品。特别是我在闽南长大,闽南因为历史原因,沉淀了层层叠叠不同时期的中原文化,这些文化提醒我们,可以和这世界交朋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能把世界介绍给孩子们当朋友,在我看来,是我们的儿童文学应该不断去努力推进的事情,也是我作为写作者必须努力去尝试的事情。

记者:作品中的动物各有性格,小白的忠诚、阿花的“侠气”、黑咪的懂事、佐罗的执着、米点的认家、大贵的超强记忆力……和这些朋友相处,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希望小读者



们能从它们身上学到什么?

蔡崇达:这本书表面上看,是一本回忆成长历程中出现的各种小动物的故事,但实际上,是试图把“全世界”努力介绍给所有人的故事。这“全世界”,有天空、大地、云朵和风,有动物和植物等各种生灵,找到它们的生命力与人性的连接点,便是促使人认识世界、连接世界的过程。所以,我自然要调动我全部的记忆和感受,找到我的生命与诸多生灵情感相连的接口。这些接口在人的感受这一端,经由人命名,便是人格化的性格,比如义气、忠诚、侠气等。或许可以说,其实是人连接了生灵,在自己的内心投射出生灵,生灵也因此得以映照人心。

同时,这本书要介绍的朋友不光是生灵们,还有人在舒展开自己、舒展开与这世间的关系时会碰到的各种情绪和困惑,包括生老病死,包括人的诸多“无法”和“不能”。这些“朋友”藏在人间,自然也可以借助书中所描绘的一个个生灵与人的故事去显现。因此,这些人与动物的故事,也是各种生命不同面貌的故事。

故事能够带给正处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人以新的感受、思考、理解和体认。当读者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获得与其他生灵相连接的经验,或许就会记得自己的生命与世界也有着可以相互陪伴、相互构成的关系。在故事中遇到那些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生而为人和各种生命状态,并且看到和它们交朋友的方式,或许我们也会因此多一些和自己、和世界相处的可能性。



蔡崇达

记者:阿太是贯穿全书的关键人物,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消解了大家关于分别的悲伤。这个角色有原型吗?她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何种影响?

蔡崇达:阅读过我作品的人,应该都很熟悉“阿太”了,她出现在我的许多故事里。事实上,出版社的编辑和我说过,通过各种反馈来看,我的读者大部分是“阿太粉”。

在我的生命中,确实确实有这样一个阿太,和故事里写的一样,她活到99岁,是我外婆的母亲。在真实的生活里,我确实是由阿太陪伴成长的,在我搭建自己内心的秩序、建立和世界的相处模式的过程中,阿太一直陪着我。或者说,阿太身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我精神体系搭建的基石。

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常常更容易从爷爷奶奶及以上的老辈那里获得更明确和强烈的情感陪伴。因为父母在孩子成长时,还处在社会分工的压力中,更容易着急培养孩子参与世界、适配世界的能力,而长辈们大部分已经脱离社会分工,在生命的后期,更在乎回到人本身的感受和体验。老人们以自己的“皮囊”为载体,从这世间装载了满满当当的故事和感受,他们的生命经验,本身便是可以滋养后代生长的精神沃土。在我的理解中,阿太代表的,便是这片土地所积攒的一代代留存的生命和精神秩序。她调动了整片土地的精神和魂魄抚养我。

记者:《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以童年视角叙事,语言充满童真,但字里行间又隐藏着成人世界的沉重。您有担心



过,这种对生活苦难或者不幸的书写,会影响孩子们对作品的接受吗?

蔡崇达: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以童书的姿态正面介入“成人世界的沉重”,或者说,介入人走向成人、走向世界必然要迎面撞上的诸多“沉重”。

儿童到少年、少年到青年,人的一生都会随着生命的舒展和命运的展开,在不同阶段遇见生命的不同面貌。我们总要遇到生老病死这样无法拒绝、无法躲避、无法不与之相处的“无法”和“无能”,会不断发现自己内心持续生长着的、相互冲突又浑然一体的情感和欲望。我们后来总站在成人的视角,觉得儿童到少年时期接触某些人世间的沉重“太早”,但事实上,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儿童到少年时期恰恰正是身体和内心长出新鲜又芜杂的情感的爆炸时刻。我们觉得“早”,其实可能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与那些命题很好地相处,但可以再自我追问一下,如何与这些命题相处,我们真的可以在此后的某个人生阶段,找到笃定不变的、到此为止的答案吗?应该不是的。我们需要培养与这些“无法”和“不能”相处的能力,因此我觉得,或许应该在这些东西刚刚出现时,就开始去学习方法,去寻找方式,去建造秩序。

事实上,关于我们与自我、与世界最核心的关系,在我们最稚嫩的儿童时期便已向我们提问了。如果没有在人生最开始的时候就与之建立一个好的相处模式,那么,因为无法与之相处而导致的困难和窘迫,从儿童时期便会开始啃咬我们的内心。正因为在最稚嫩的儿童时期,便要迎接最本质的世界的追问,所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经常会是全年龄段读者都喜欢阅读的作品——因为那些最开始呈现的命题,也是会贯穿我们一生的命题。

所以我觉得,写作儿童文学,有时候非常需要勇气。你必须采用人在稚嫩时期的情感和理解路径,去直面最本质也最沉重的命题。也正因此,《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开头第一个词语便是“离世”,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沉重,最大的“无法”和“不能”。

记者: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您和女儿共同创作的,在您看来,今天的小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作家应当如何更好走进孩子的内心?

蔡崇达:一百多年前,文字还是极少数人能拥有的技能,精神世界的娱乐和建设,还是极少数人能享有的奢侈品。在当下,信息革命也已经多年了,各种信息传播和内容表达工具爆炸性发展,孩子们不仅要面对内心强烈的情感和欲望,要面对生命历程展开过程中会迎面撞上的各种命题,还要面对社会生活中如海啸般袭来的海量信息和内容。

一方面看,今天的孩子比任何时期都不缺精神产品,另一方面,今天的孩子接受到的各种精神冲击,也比任何时期的孩子更大、更汹涌、更剧烈。因此,在我看来,生命教育成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被注重和完善的教育,精神秩序的搭建也成了孩子最重要的课程和能力。儿童文学作家本就应该站在孩子内心的第一线,或者说,在我理解中,也只有和孩子们一起,站到他们内心的第一线,以文字确切地感知并陪伴孩子,才称得上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家。

# 以科学为骨,以想象为肉,以对生命的敬畏为魂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王威廉

□本报记者 康春华

记者:王老师您好,恭喜您的《火苗照亮宇宙:暗生命传奇》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这部作品中,您将目光从近未来的高科技转向更宏伟和神秘的宇宙。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王威廉: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我也在琢磨。回望来时路,清理自己的路径,对写作者是非常必要的。我想,此前,我的写作更多地聚焦于近未来人类社会的变革,坦白说,这不免带来一些精神压力,因为未来的图景,总伴随着诸多迷茫与不确定,正如我的小说《野未来》的标题,未来的那种野性是让人难以把握的。

那么,抛开那些不能把握的虚妄与焦虑,我的创作初心究竟何在?我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曾对世界怀揣着何等虔诚的着迷。深夜仰望银河,对宇宙的浩瀚充满了无限的向往。我渴望重新寻回那份初心,重拾少年人的纯粹心态。对于我此刻的创作状态而言,这至关重要。所以,这不仅是一部写给少年读者的科幻小说,更是我献给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少年的篇章,是一次对最初好奇与梦想的温柔回溯。

记者:“暗生命”这一设定,暗含了当代人关于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之间关系的想象。您假想这是一种以碳基为起点,逐步演变为硅基生命的生命历程。这其中倾注了怎样的关于生命、人类命运与文明的思考?

王威廉:我一直在思考生命本身的意义。这种追问也体现在我同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有机体》中。在其中,我不无黑色幽默地设想了一个硅基文明偶然发现碳基文明的场景,这是一种独特的逆向思维,打破对生命形态的固有认知。

若要在一个更宏大的尺度上去审视生命,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那浩瀚而遥远的宇宙。我一直忘不了费米悖论的追问:既然宇宙如此古老、如此广阔,那么无数的生命必然存在,为何我们至今未曾遇到或发现他们?这个疑问如同一道迷雾,始终笼罩在我的思考之上。这是否暗示着,生命的形态可能千差万别,并且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它们会演化出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和感知存在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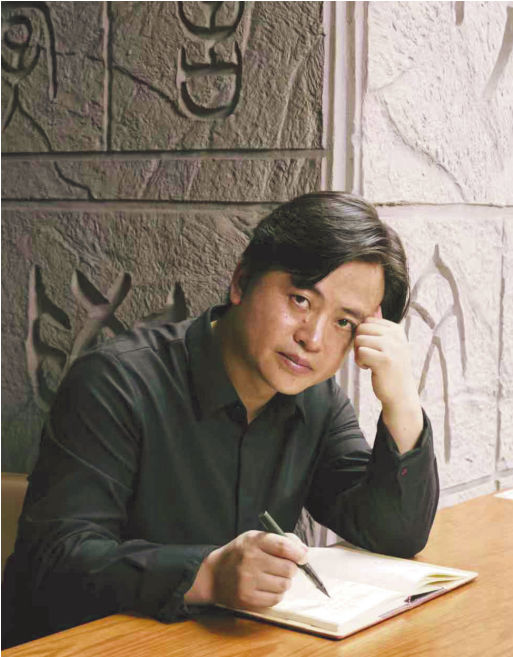
由此,我不免想到,是否存在着一些我们无法观察到,但却比我们强大无数倍的生命形态?

它们可能以一种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方式存在,就像我们面对黑洞时所感受到的无力和困惑一样。黑洞本身就是宇宙中最神秘、最能触及物理学极限的物体之一。它的存在似乎集聚了宇宙中关于极限的种种奥秘,也正因此如此,它激发起我对生命在极端条件下可能演化出的各种奇特形态的无限遐想。暗生命不仅超越了碳基,也超越了硅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生命的物质自由。但它们却怀念人类的身体,将其当作自身“童年时代”的乡愁。这种超越此刻人类历史阶段的视角,反而能为我们珍视当下提供一种文学的理解与抚慰。

记者:近些年来,您着力创作科幻小说,以这种文学形式探讨一系列更宏大、更关乎人类命运与未来的主题。如今,这种“科幻转向”体现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这其中有这样的考量?在您看来,创作“成人向”的科幻小说与“少年儿童向”的科幻小说有何差别?

王威廉: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极其依赖想象力的文学类型,它要求作者拥有“天马行空”般的创造力,而这份创造力,我深信离不开那份宝贵的“童心”。吴岩在《科幻文学论纲》中将科幻作家进行“簇”类划分,“大男孩作家簇”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具体来说,他将科幻作家分为四个“簇”:女性作家簇、大男孩作家簇、边缘人作家簇和全球化落伍者作家簇。其中,“大男孩作家簇”指的是那些具有童情怀、对未来充满科技憧憬的作家,他们如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保持着对技术和未知世界的纯粹迷恋。我认识很多科幻作家,他们心中确实都住着那样的孩子。这恰恰说明了科幻文学在这一领域拥有天然的优势,能够呈现“老少咸宜”。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其最初的受众往往还是青少年儿童。

然而,面向儿童的科幻文学,与面向成人的科幻文学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区别。首先,科普性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正处于想象力蓬勃发展的青少年来说,在他们的奇思妙想之中注入一定的科学知识,就如同为他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坚实的“支点”,使得想象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一定的认知基础之上,变得更加扎实。这一点,正是科幻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的独特之处。童话的想象力可以不拘一格,不需遵循物理



王威廉

学的规律,但科幻作品面向儿童时,则需要增加这种科学的严谨性。

其次,在内容选择上,我们应当避免成人世界中那些过于敏感和复杂的话题,尤其是关于各种认同的问题,这些对于孩子来说尚且为时尚早。相反,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关注更本质的问题,例如“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宇宙的本质是什么?”这类对世界本源的追问,在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因为生活的琐碎与压力而被磨损,变得稀少。但儿童却天然地对世界的好奇与追问充满热情。因此,面向儿童的科幻作品,恰恰应该体现出这种对世界本质的探索精神。

第三,积极向上的精神能量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也与面对成人读者的科幻作品有所不同。成人科幻文学中,可以展现出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迷茫乃至对生存的绝望,以此反映我们对宇宙的未知与不安。但是,面向少年儿童,我们不必采用如此残酷或可怕的方式。相反,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尺度。在让他们意识到宇宙的荒凉与寒冷的同时,更要让他们感受到人类科学创造的伟大,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智



花城出版社2024年12月

慧。科幻文学应该是一盏引路灯,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激发他们探索未知、创造未来的热情。

记者: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当下一系列基础科技和前沿技术领域引发新的技术更迭。您最为关注哪些方面的科技创新?未来是否有相关写作计划?

王威廉:我最为关注三个关键领域的创新:人工智能、生物学以及基础学科尤其是物理学。

人工智能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的每一次革新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形态。我密切关注着AI在感知、认知乃至创造力方面的突破,因为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生物学的创新同样令人着迷。作为血肉之躯,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知,正被生物学的最新研究不断颠覆。新药物的出现,不仅有望改变人类对抗疾病、病痛的局面,甚至可能延长人类的生命。这些进步,必将对我们固有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形态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此外,我对基础学科的创新,特别是物理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尽管我们当前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月异,但从物理学的根本层面来看,颠覆性的理论创新已久未出现。正如曾经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带来的范式革命一样,基础物理学的突破,才是真正革命性的变革。

我深知,这三个领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织、相互促进的。在我的科幻小说《火苗照亮宇宙:暗生命传奇》的创作过程中,这三者早已渗透其中,并将在我未来的写作中进一步深化融合。我的写作方向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当我的目光投向浩瀚的宇宙与星辰大海时,我将致力于为少年儿童创作引人入胜的科幻故事,激发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和勇气。而当他们俯瞰大地,体味自己以及他人的人间生活时,我则希望聚焦于现实,深入挖掘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并探讨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对这一点的深度挖掘,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变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

21世纪已悄然走过四分之一,我认为,迫切需要一部能够重新定义21世纪人类文明的作品。这部作品应以科学的严谨为骨,以大胆的想象为肉,以对生命和宇宙的敬畏之心为魂,引领我们去理解和塑造未来。